

# 以新质生产力塑造国际竞争力的 逻辑、形势与路径

李嘉桐, 韩永辉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 广东 广州 510420)

**摘要:**当前时代科学技术和经济社会发展加速渗透融合,技术革命与产业变革加快重塑全球产业格局,国际竞争形势深刻变化。为了探寻中国如何适应日趋复杂严峻的国际竞争局势,研究以新质生产力塑造国际竞争力的内在逻辑,深入分析国际竞争的新趋势和中国以新质生产力塑造国际竞争力的战略路径。研究发现,新质生产力是一国形成国际竞争力的核心,新质生产力的构建有助于一国在国际竞争中获取优势;当前国际竞争呈现出以科技创新为竞争导向、以战略性新兴产业作为重点竞争领域、以产业政策与贸易限制措施为主要竞争手段、以数据治理为国际竞争新赛道的特征。研究表明,为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塑造国际竞争力,需要构建差异化导向的高层次竞争优势,推动市场消费升级加快供给转型,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以科技创新为导向推动传统产业转型,从而构筑国际竞争新优势。

**关键词:**新质生产力;国际竞争力;国际贸易;数据要素;战略性新兴产业;数据流通规则

中图分类号:F12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6248(2024)05-0069-15

收稿日期:2024-06-08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1873041;72073037);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2022B1515020008);深圳市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研究中心委托课题项目(SFQZD2402)

作者简介:李嘉桐(1998-),男,广东广州人,经济学博士研究生。

## Inner logic, situation, and pathways for shaping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through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LI Jiatong, HAN Yonghui

(Guangdong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Strategies,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Guangzhou 510420, Guangdong, China)

**Abstract:** In today's world, 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are rapidly converging, with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and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reshaping the global industrial landscape and intensifying the dynamics of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To examine how China can navigate this increasingly complex and challenging competitive environment,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inner logic of shaping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through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It provides an in-depth analysis of emerging trends in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and outlines strategic pathways for China to enhance its competitiveness by leveraging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The study finds that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serve as the cornerstone of a nation's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and fostering it allows a country to secure a competitive edge on the global stage. Currently,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in the new era is marked by the following key characteristics: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has become the central axis of competition, strategic emerging industries represent critical competitive domains, industrial policies and trade restrictions are prominent tools in the competitive arsenal, and data governance has emerged as a pivotal arena in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The research suggests that to accelerate shaping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through the developmen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China must focus on building differentiated, high-level competitive advantages, promoting market consumption upgrades to drive supply-side transformation, fostering and expanding strategic emerging industries, and advanc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traditional industries with a focus on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These measures aim to establish a competitive edge in the international arena.

**Key words:**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international trade; data element; strategic emerging industry; data circulation rule

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深入推进,科学技术和经济社会发展加速渗透融合,技术变革加速全球产业格局重塑,逆全球化思潮涌现,国际竞争形势日趋严峻复杂,国际竞争力的塑造显得愈发重要。在此形势下,新质生产力的提出为塑造国际竞争力提供了重要启发。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对于塑造国际竞争力具有重大的意义与战略价值。一方面,新质生产力可通过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来创造国际竞争优势。新质生产力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重要标志,而要素生产率是国际竞争力的根本来源,拥有更高的要素生产率将在国际竞争中占据更加有利的地位,如何创造有利提升生产率的环境,成为一国塑造国际竞争力的关键。另一方面,新质生产力通过适应国际竞争新形势,为塑造国际竞争力提供有利条件。当前大国间博弈竞争在科技、贸易、产业等多领域已趋于白热化,并呈现新的阶段性特征:以科技创新为竞争导向、以战略性新兴产业为重点竞争领域、以产业政策与贸易限制措施为主要竞争手段、以数据治理为国际竞争新赛道。新质生产力以科技创新为重要驱动力,以战略性新兴产业为主要支撑,发展新质生产力是主动适应国际竞争新形势、打造国际竞争新优势的必然举措。

本文在把握新质生产力理论内涵的基础上,研究以新质生产力塑造国际竞争力的内在逻辑,分析面临的国际竞争形势,从而探寻中国以新质生产力塑造国际竞争力的战略路径,形成国际竞争新优势抢占发展制高点,在

国际竞争中赢得主动权。

## 一、文献综述

从国际贸易理论的比较优势开始,学界对于国际竞争力的理论研究由来已久。国际贸易理论认为可以通过外贸竞争力来衡量一国的整体国际竞争力,因为国际贸易是国家间竞争最直接的形式,一国商品在国际上的竞争力反映出其背后国家的整体生产能力。国际贸易理论曾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国的国际竞争力,但随着时代的发展,仅靠外贸竞争力已难以解释一国的整体国际竞争力。在认识到传统国际贸易理论的局限性后,部分学者转向了以竞争优势为基础的国际竞争力研究。国家竞争优势最早由 PORTER 提出,他指出国家层面的国际竞争力就是国家生产力,一国拥有更高的科技创新水平,其整体生产率的发展速度就会领先于其他国家,由此便形成了竞争优势<sup>[1]</sup>。随着中国越来越深入参与到世界经济的发展当中,同时国际竞争格局加速演变,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分析中国面临的国际竞争形势,研究中国如何塑造自身的国际竞争力。阎学通认为技术标准正成为国际规则制定权之争的重点,当前国际格局两极化竞争的核心是技术优势<sup>[2]</sup>。陈楠等提出,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叠加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全方位冲击下,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面临更为激烈的国际竞争<sup>[3]</sup>。裴长洪等研究发现,随着外贸新业态不断涌现,中国外贸的新优势正在初步形

成<sup>[4]</sup>。余南平等指出数字竞争力是数字经济时代塑造新型国际关系和国际体系的关键力量<sup>[5]</sup>。于是在当前国际竞争形势之下,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以关键性颠覆性技术突破作为显著特征的新质生产力,成为一国塑造国际竞争力的关键。

目前学界对于新质生产力的研究已广泛且深入。黄群慧等从生产力的基本内涵出发,提出新质生产力主要由新型劳动者、新型劳动对象、新型劳动工具、新型基础设施等要素构成,在结构承载上表现为由新兴产业、未来产业等主导发展形成的现代化产业体系<sup>[6]</sup>。蔡继明等指出技术创新是新质生产力价值创造的根本动因,并可带动传统产业发展<sup>[7]</sup>。蒋永穆等借助对新质生产力运行机理的分析,提出新质生产力可以通过技术系统将要素系统革新的牵引力传导至产业系统,最终实现对传统生产力的全面重塑<sup>[8]</sup>。在此基础上,更多的学者对新质生产力的形成条件和形成路径产生了兴趣。方敏等认为生产力质变的本质在于通过要素及其组合的变化引起生产方式发生根本改变,并推动和加快新的生产关系和生活方式的形成,新的通用技术和主导部门的形成是生产力质变的重要表征<sup>[9]</sup>。张翱等则更具体地指出,算法规制和算力驱动的资源配置新模式是生成新质生产力的基本逻辑,数字经济运行的机制借助优化资源配置,将传统生产力转变为新质生产力<sup>[10]</sup>。任保平从生产力现代化转型的角度出发,指出形成新质生产力必须遵循生产力现代化的规律和趋势,构建包括科技

创新体系、现代化产业体系、绿色生产力体系和相应的生产关系体系在内的新质生产力体系<sup>[11]</sup>。

现有研究对于新质生产力和国际竞争力的研究已较为充分,但目前从国际竞争视角对新质生产力进行研究的文献仍然较少,且尚未有文献结合当前国际竞争形势的特征,分析新质生产力为何可以帮助一国塑造其国际竞争力。本文试图在国际竞争的视角下,研究以新质生产力塑造国际竞争力的内在逻辑,结合当前国际竞争形势的特征,构建中国以新质生产力塑造国际竞争力的战略路径。

## 二、以新质生产力塑造国际竞争力的内在逻辑

### (一)新质生产力的理论内涵

马克思将生产力定义为人类在劳动生产过程中利用自然,改造自然,使其适应自身需要的物质力量,主要由劳动资料、劳动者和劳动对象三者构成<sup>[12]</sup>,生产力可视为这3个关键要素相互作用的生产系统。生产力水平即是劳动者运用劳动资料对劳动对象进行生产活动的效率,生产力效率的提升和生产力的发展既可来源于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这三者单维度的优化提升,也可以来自于三者的有机优化组合和配置。由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等生产力基本要素的优化组合和配置产生质变而产生的新生产力形态,即是新质生产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生产力的解释,可视为研究新质生产力

重要、基础的理论依据,这一理论不仅阐释了生产力的基本要素,而且强调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规律,为生产力的时空演变和动态化阐释提供了思想基础,并由此为新质生产力的研究提供了理论切口。

区别于传统生产力,新质生产力的“新质”,一方面体现在科技创新对于生产力基本要素的优化升级和生产关系的改善上。生产力基本要素的优化升级,即劳动者的知识水平和劳动技术的提升,劳动资料由农业工具发展到手工业工具再发展至电气化、自动化和智能化,劳动对象由自然物、原材料到实体产品再到信息数据。基本要素从根本上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其每次跃迁都象征着从传统生产力向新质生产力的转化。生产关系则从原始社会开始到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再到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社会,通过不断变革推动资源和要素配置效率的持续优化,从而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另一方面,新质生产力在劳动域拓展上也有所体现,即产生新的劳动空间,如网络空间、数据空间、深空、低空、深海、量子微小空间等。结合当前的技术发展趋势,所谓新质生产力是指不同于既有传统生产力的,在基本要素、生产关系与劳动空间上与传统生产力相比都呈现出新质态,并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以关键性颠覆性技术突破作为显著的特征,从而与传统的生产力进行区分的生产力。

新质生产力以新技术、新经济、新业态为主要内涵<sup>[13]</sup>。一是新质生产力的新技术内涵,即以科学技术为第一生产力。强调关键

性颠覆性技术突破,超越了传统意义上量的维度上的技术创新,属于质的跃升,表示新质生产力的关键性技术维度。要推动生产力向更先进的质态演变,需要通过科技创新对劳动资料、劳动者和劳动对象三大生产力基本要素进行重新塑造。二是新经济强调通过科技创新与制度创新形成更高效的经济结构和经济形态。新经济来源于劳动方式的演变,实现了技术到经济的衔接,象征新质生产力的经济维度。供需关系是经济运行中的基本关系,而市场的需求实现程度与供给能力又受到生产力的具体发展制约,依赖于新质生产力来实现高质量的供需动态平衡,并通过更高效的供需匹配推动经济良性循环。新的需求对供给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从而刺激和引导新供给的形成,最终撬动生产力跃升。三是新质生产力的新业态内涵,即对于整体产业体系、上下游全产业链条和相关支持产业布局的完善。如以数字科技推动传统产业的转型,推动生产力发展的技术范式与数字经济范式的协同转换,推动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深度融合,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促进产业融合化发展,建立上下游互融共生、分工合作、利益共享的产业发展新模式。

## (二)以新质生产力塑造国际竞争力的内在逻辑

波特钻石模型,即国家竞争优势理论指出<sup>[2]</sup>,一国国际竞争优势的来源在于其为企业提供的环境质量,并提出环境质量取决于4个直接因素和两个辅助因素,直接因素即

生产要素、需求情况、支持性产业及相关产业状况和企业战略、结构与竞争,辅助因素即机遇与政府,辅助因素需通过4项直接因素发生作用。在这6个因素上拥有更多有利条件的国家、产业和企业就能够在国际竞争获取更强的国际竞争力。

新质生产力通过推动低层次竞争优势向高层次竞争优势的转化,从而塑造更强的国际竞争力,尤其体现在波特钻石模型的4个基本要素上。一是在生产要素上,新质生产力的新技术内涵要求以科技创新作为核心驱动力,以更高素质的劳动者为关键要素,摆脱传统生产力依靠资源大规模投入为特点的粗放式发展方式的弊端,从依赖自然资源、地理位置、气候等初级要素以及依靠规模经济形成的低成本竞争优势,转向追求科技创新先进技术、高素质人才等更有利于形成高层次竞争优势的高级要素。二是在需求方面,新质生产力的新经济内涵强调形成与新技术相适应的新经济形态,新经济中的新需求对供给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国内企业和产业的供给质量形成压力,牵引和激发新供给,从而创造更具有竞争力的产品。三是新质生产力的新业态内涵对新型产业生态的建设做出了要求,以满足对于“相关产业和支持产业表现”与“企业战略、结构与竞争”两个要素的需求。新质生产力要求推动产业组织和产业形态变革调整,促进生产组织向生态化、数字化与平台化转型,营造以创新为导向,供需精准匹配,高度共享资源、企业间紧密协作的全链条产业生态圈,使得生产要素高效流

动。最终塑造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科技创新导向型产业竞争生态与相关支持产业集群。

在全球市场经济高度发展的背景下,社会再生产过程的各环节高度市场化,企业仍是国际竞争的直接主体,政府和国家并不直接参与国际竞争,其通过企业和产业为载体间接地参与国际竞争。企业能在国际竞争中获取竞争优势,本质上是因为拥有更高的生产率<sup>[14]</sup>。所以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对于塑造国际竞争优势至关重要,一国需要借助科技创新推动生产要素向高级生产要素转化,同时优化各要素之间的分配组合,形成相应的生产关系,最终推动生产力的跃升,发展新质生产力,以更高的生产率在国际竞争中获得优势。

### 三、中国以新质生产力塑造国际竞争力面临的形势研析

一国如何塑造并保持自身国际竞争力并不完全取决于内部,也与其所处的国际竞争环境的发展形势密切相关,外部竞争形势甚至会反过来塑造一国的产业生态,并对其将来国际竞争力的塑造产生深远的影响。新质生产力以科技创新为动力,以战略新兴产业为主要载体,是一国构建国际竞争力的关键所在。当前国际竞争领域以科技创新和战略产业为重点,同时在全球经济下行、大国博弈加剧、地缘政治冲突频发、数字经济蓬勃发展背景下,产业安全与新兴战略产业的战略价值,逐渐成为国家开展国际竞争时的重要考量因素,并由此催生出各类产业政策与贸易

保护措施,国际贸易环境出现恶化趋势并加剧国际竞争形势,对中国塑造新质生产力与提升国际竞争力形成了多重冲击与挑战。

### (一) 大国科技竞争与博弈趋于白热化

当前全球科技竞争态势依然剧烈,各国都意识到,在国际科技创新竞争中获取领先地位,将对其社会、经济与安全等各个方面产生重大的影响。目前国际间科技竞争由美欧等主要经济体围绕人工智能领域、半导体等重点领域展开,其中以中美间的科技竞争尤为激烈。

一国的对外科技战略取向通常受其自身科技实力及其在国际科技竞争中所处地位的影响。中国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科技创新水平快速提升,在量子通信和5G通信等部分科技领域已然实现领先,但在整体上仍将长期作为一个“赶超者”的角色,在继续积极对外寻求合作的同时,政策重点主要在自身科技水平的提升上<sup>[15]</sup>。在《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中提出坚持创新在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2023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也将科技创新列为工作重点,指出2024年将以科技创新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特别是以颠覆性和前沿技术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新质生产力。

相较之下,美国的科技发展战略则带有浓厚的竞争目的,尤其体现在对中国的科技

与产业竞争策略上<sup>[16]</sup>。美国在2021年发布的《美国创新与竞争法》(United States Innovation and Competition Act of 2021)是其近年来科技产业政策的缩影,法案提出将运用2500亿美元政府投资提升关键行业的全球竞争力,显示出美国重塑国家创新体系,以维护先进技术全球领先地位的整体思路。一是在具体的领域,2018年,美国发布《国防部人工智能战略》(Department of Defens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Strategy)将AI视作“确保美国能够打赢未来战争的关键技术之一”,并在2022年发布《国防部负责任人工智能战略和实施路径》(U. S. Department of Defense Responsibl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Strategy and Implementation Pathway)进一步完善了人工智能发展战略。2023年9月美国商务部发布《芯片和科学法案》(CHIPS and Science Act)国家安全“护栏”的最终规则,限制美国芯片企业投资与合作的自主权,旨在断绝受补贴企业与受关注国家合作的可能性,并将中国作为“护栏”规则明确确定的限制对象,“在与中国的竞争中占据优势”这一竞争理念贯穿于立法全过程。二是在具体措施上,美国商务部以违反《出口管制条例》(Export Administration Regulations)为由,针对性制裁打击中国的科技企业与机构,自2016年将中兴通讯列入“实体清单”开始,2019年将包括华为在内的37家中国企业、科研院所、高等院校等机构列入“未经验证清单”和“实体清单”,至2024年5月9日,继续将上海量子科学研究中心、北京量子信息科学研究院等多

家“量子技术”相关领域实体列入,制裁规模不断扩大,其中还包括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北京量子院、中科院量子创新院、中科院物理所等多家科技研发机构<sup>①</sup>。

欧盟于2020年出台的人工智能白皮书《面向卓越和信任的欧洲人工智能发展之道》(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A European Approach To Excellence And Trust)试图推动欧洲成为可信人工智能领域的全球领导者。2022年2月欧盟委员通过《欧盟芯片法案》(European Chips Act)将投资、监管框架和必要的战略伙伴关系相结合,以聚集全球领先的研究机构和设备制造商,突破先进芯片的设计、制造和封装技术,使欧洲在市场上占据领导地位。法案主要目标之一在于使欧洲在芯片这一战略性市场上成为行业领导者。同年7月欧盟委员会通过《新欧洲创新议程》(New European Innovation Agenda)以加强欧洲在全球的技术领先地位,为欧洲各国争夺全球科技创新领域高地创造有利条件。

白热化的全球科技竞争背后,反映各国对科技创新与国际竞争优势塑造之间线性关系的深刻认知。美国、欧盟对于科技创新给予如此大规模的资源倾斜与高强度的政策注意力,源于对“投入-产出”因果机制的技术创新线性范式的遵循<sup>[17]</sup>,即一国从基础研究到应用研究,再到试验发展和产业化等一系列技术的上中下游环节,依次实现从知识生产到经济增值的线性逻辑。在此逻辑下,当一国对某一类产业链条的上游技术研发环节具有技术主导优势,就意味着该国对整个产

业链和供应链具有更强的控制力。若主导者利用自身的技术权力影响全球产业链与价值链的演变和重构,甚至通过制造技术壁垒和操纵国际规则维持自身在科技竞争中的主导权力,在技术上处于劣势的后发国将难以实现对主导国的追赶,并将在全球科技竞争中长期处于劣势<sup>[18]</sup>。

## (二) 贸易限制措施恶化国际贸易环境

根据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官方更新的全球贸易数据显示<sup>②</sup>,2023年全球贸易额约为31万亿美元,与2022年的最高纪录相比缩减近1万亿美元(3%),并指出除了全球经济复苏乏力之外,持续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和地区冲突、贸易限制措施和内向型产业政策的大规模使用也是国际贸易负增长的重要原因。同时,全球贸易预警数据库(Global Trade Alert Report)显示,2023年全球贸易限制措施达到了约3000项,2019年仅为1000项<sup>③</sup>。在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局部冲突和动荡频发,全球性问题加剧等综合作用下,各国国际贸易竞争加剧,频繁互设贸易壁垒,其中的代表性事件为中美贸易摩擦和西方国家对俄罗斯制裁。2018年美国主动对中国掀起贸易摩擦,随后中美双方开展

① 数据来源:美国商务部官网(<https://www.commerce.gov/>)。

② 数据来源: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https://unctad.org/publication/global-trade-update-march-2024>)。

③ 数据来源:全球贸易预警数据库([https://www.globaltradealert.org/data\\_extraction](https://www.globaltradealert.org/data_extraction))。



多轮制裁与反制裁,并在短时间内导致全球供应链的分裂和全球贸易的下滑<sup>[19]</sup>。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后,美国对俄罗斯施加金融制裁,通过将俄罗斯多家银行系统剔除出国际资金清算系统(Society for Worldwide Interbank Financial Telecommunications, SWIFT),冲击全球贸易秩序。总体上,以美国为首推行的国际贸易单边主义回归、霸权主义上扬、保护主义抬头等逆全球化思潮对全球贸易发展产生显著的消极影响。

在国际贸易环境恶化下,以新质生产力塑造国际贸易竞争优势显得更为紧迫。一方面,需要以新质生产力推动外贸转型升级,从而塑造新的国际贸易竞争优势。数字经济的发展有利于对外贸竞争力的提升<sup>[20]</sup>,而新质生产力可以加快数字技术、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赋能传统产业的进程,进而提升传统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通过高附加值产品输出优化外贸结构。同时,在绿色低碳发展背景下,中国的电动汽车、锂电池和光伏等新能源和绿色低碳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已形成强大的竞争力。新质生产力可以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推动生产过程清洁化、资源利用循环化、能源消费低碳化、产品供给绿色化,进一步扩大中国外贸产品的国际竞争优势。另一方面,新质生产力通过国际贸易生态的再塑造,为构建国际竞争优势创造有利条件。数字经济日益成为国际贸易发展的新趋势和新的增长点<sup>[21]</sup>,同时催生了数字贸易、跨境电商等新业态,在打破传统时空限制,开拓新的贸易空间的同时,加快了数字经

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重塑传统贸易生态。新质生产力是数字贸易创新发展的动力来源,也是推动传统贸易向数字贸易优化升级的重要力量,加快形成数字新质生产力,有利于在新型数字贸易生态中的把握先发竞争优势。

### (三) 产业政策泛滥加剧国际竞争

当前,全球各国对于战略产业高地的争夺趋于激烈,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的研究显示,2023年全球各国公布超过了2 500条产业政策,相比2019年增加了3倍,其中美国、欧盟和中国几乎占2023年所有新措施的一半<sup>①</sup>。战略性产业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并体现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综合国力特别是核心竞争力,其战略价值体现在可以从根本上改变一国的产业地位,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是获取竞争新优势的关键之举。能否制定适合本国现状和未来的产业政策,推动产业结构升级,有效提升相应产业的生产率<sup>[22]</sup>,最终建成富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对于一国国际竞争优势的塑造至关重要。

在诸多产业政策中,美国《通胀削减法案》(Inflation Reduction Act, IRA)带有明显的保护主义倾向与竞争色彩。法案在2022年9月正式立法,计划将3 690亿美元用于对美国本土新能源产业进行投资与补贴,鼓

① 数据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研究报告》(The Return of Industrial Policy in Data) (<https://www.imf.org/en/Publications/imf-how-to-notes/Issues/2024/03/11/Industrial-Policy-Trade-Policy-and-World-Trade-Organization-Considerations-in-IMF-546102>)。

励企业在美国国内采购关键物资,吸引制造业回流等。在其后续发布的细则中,规定美国产电动车包含中国等国家制造或组装的电池组件将不能享有税收抵免,意图针对性打击竞争对手的新能源产业。欧盟随后在2023年2月1日提出了“欧盟绿色协议工业计划”(The Green Deal Industrial Plan)。该计划将从现有的欧盟基金中拨出2500亿欧元,用于工业绿色化,包括为投资净零排放技术的企业提供税收减免。以提高欧洲净零工业的竞争力,支持欧洲向气候中和快速转型。该计划被认为正面对标《通胀削减法案》的重要产业保护计划,以防止欧洲工业及相关价值链产业转移至美国。此外欧盟委员会还在2023年3月提出《净零工业法案》(Net-Zero Industry Act)制定了一系列清洁技术目标,与美国的大规模绿色补贴计划竞争。

为占据国际竞争制高点,各国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竞争已日趋激烈,其战略价值也逐渐显现。以零碳、清洁、高效、可持续为目的的新能源技术,以脑机接口、基因编辑、再生医学和合成生物为代表的生命科学技术,以新材料、数字化、机器替代为方向的新型制造装备技术,尤其是以人工智能、移动通信、物联网、区块链、量子信息、高端芯片、元宇宙为重心的新型信息技术<sup>[23]</sup>,都在深刻影响着全球产业结构、经济版图与全球治理格局<sup>[24]</sup>。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是培育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载体和主要阵地,以新质生产力所蕴含的新技术内涵为指引,有助于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加快发

展,以产业化的形式在国际竞争中占得先机,强化竞争优势赢得战略主动,重塑国际分工格局以及增强国际话语权。

#### (四) 数据要素成为国际竞争新赛道

数字技术和数字经济已成为全球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核心,数据要素化与资产化是其中的重要议题。在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等要素之后,数据作为第5个关键生产要素,能够显著提升企业和经济体的创新能力和生产效率<sup>[25]</sup>,已然成为国家基础性战略资源。数据控制能力是国家参与国际数字经济治理的重要支撑,也是国际竞争的新焦点。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的快速发展,各国对于数据资产的重视程度越来越强,对于数据的运用与跨境流动管制与相应的法规制订也愈加完善,国际上的数据战略竞争可视为各国在数据收集、分析、利用方面的竞争和争夺。构建适应数字经济发展的数据治理体系,已成为提升国家竞争力的战略性课题。

由于数据治理规则的发展远远滞后于数字经济的发展速度,国际社会对于信息安全和跨境数据安全仍未形成统一共识,各主要经济体对于数据治理规则的竞争仍呈现合作与竞争交叠的多元竞合态势。各经济体主要通过构建国内乃至区域性的数据流通规则,在区域内形成权威性制度,并通过各种渠道以及自身影响力将向外输出制度规则,以争夺国际数据流通规则的制定权。

在主要措施上,第一,构建数据的跨境流

通规则,对其流通进行直接控制。以美国为例,通过《外国投资风险审查现代化法案》(Foreign Investment Risk Review Modernization Act of 2018)、《关于保护美国人的敏感数据不受外国敌对势力侵害的行政命令》(Protecting Americans' Data from Foreign Adversaries Act of 2024)以限制敏感数据出境。同时参与《安全港协议》(SafeHarbor)、《隐私盾协议》(EU-US Privacy Shield)、《跨境隐私规则体系》等机制帮助本国企业获取境外数据,运用《澄清境外合法使用数据法案》扩大其数据司法管辖权范围,拓展对于境外数据的获取权。欧盟则通过一系列战略性立法举措,全面强化其数据主权和跨境数据治理能力。《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和《欧盟外国直接投资审查条例》(A Regulation on Establishing A Framework for Screening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s into The European Union)分别通过将个人数据存储于欧盟境内、限制外商对欧盟数据处理、存储和对关键数字技术领域的投资,防范敏感数据的外流。对应的,中国出台《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推荐管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数字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数据出境安全评估办法》等法规,逐步完善数据出境监管体系,此外还颁布《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严格把控本国经济、关键基础设施、金融、地理等领域的敏感数据出境。

第二,通过签订区域性协定、建立合作伙

伴关系等方式争夺国际数据流通规则的话语权与制定权。欧盟提出《塑造欧洲数字未来》(Shaping Europe's Digital Future),试图利用其统一市场优势,与盟友共建以数据自由流动、源代码保护和非本地化为核心的区域数字贸易规则,其提出“全球数字合作战略”并在七国集团(Group of Seven, G7)、世界贸易组织(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等平台推广其治理方案,力求在全球数据治理中占据主导地位。美国则通过《美日数字贸易协定》(The U. S. -Japan Digital Trade Agreement)和《美墨加协议》(United States-Mexico-Canada Agreement)等推进有利框架,同时借助《欧盟-美国数据隐私框架》(EU-US Data Privacy Framework)与欧盟建立数据隐私合作机制。《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omprehensive and Progressive Agreement for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CPTPP)为日、韩、加、澳等国提供参与平台,在全球数据治理中谋求优势。中国则通过深化参与《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RCEP)、《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igital Economy Partnership Agreement, DEPA)和 CPTPP 中关于数字经济的部分,试图在区域数字经济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同时,提出和参与《关于电子商务的联合声明》《全球数据安全倡议》《“一带一路”数字经济国际合作倡议》《关于中德数据跨境流动合作的谅解备忘录》等倡议与协定,提升自身在国际上的数据跨境规则制定权与话语权。

相较于传统领域的国际竞争,一国数据治理领域的国际竞争水平与其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的联系更加紧密。新质生产力的技术创新可以引领数据治理新范式。一是发展新质生产力必然涉及前沿数字技术的应用和创新,尤其对于人工智能技术、区块链技术、量子计算、6G 等技术的掌握,使得一国能够在国际数据治理讨论中提出更具前瞻性和可行性的建议。如在数据隐私保护、跨境数据流动、数据安全标准等关键议题上,技术领先国家往往能够提供更有说服力的规则制度,从而在国际规则制定中占据主导地位。二是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过程中,将累积大量高质量、多样化的数据资产。包括工业互联网产生的海量生产数据、智慧城市运营中的城市管理数据、数字医疗领域的健康医疗数据以及智能交通系统中的交通流量数据等,这些数据资产不仅具有巨大的经济价值,还可以为制定数据治理规则提供经验基础。拥有丰富数据资源的国家,善于更好地理解数据价值链和数据生态系统,同时在数据分类、数据权属、数据定价等问题上提供更有说服力的建议,可以在国际谈判中争取更有利于自身数据资产保护和利用的条款。

## 四、中国以新质生产力塑造国际竞争力的战略路径

### (一) 构建差异化导向的高层次竞争优势

基于新质生产力的新技术提升,推动企

业从单一低层次竞争优势转向差异化竞争优势。一是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持续加大对关键核心技术的研发投入和攻关力度,突破关键技术瓶颈,健全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的技术创新体系,提升企业自主创新动力,建立健全知识产权保护机制,为创新成果转化创造有利环境。这些举措有助于增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为企业塑造差异化竞争优势奠定基础。二是推动产品和服务升级。鼓励企业依托新技术开发功能更强、性能更优的差异化产品,支持企业提升产品设计水平,增强产品独特性和附加值,促进产品向智能化、个性化、绿色化方向升级,满足消费者多样化需求。三是优化产业链供应链。推动产业链供应链的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提升柔性生产能力,鼓励企业间的开放合作,形成上下游协同的产业生态圈,完善产业配套服务体系,为差异化产品提供更优质的配套支撑,为企业创新提供良好的产业环境基础。四是培养创新型人才。加强科技、设计、营销等创新型人才的培养和引进,健全人才流动机制,促进不同领域人才的跨界融合,为创新型人才提供良好的创业创新环境和发展空间。

### (二) 推动市场消费升级加快供给转型

以新质生产力为基础推动市场消费升级,为企业充分发挥新技术、新模式的优势创造良好的市场条件和消费环境。一是持续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完善收入分配机制等措施,促进中低收入群体收入水平提升,持续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缩小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增强居民购买力,扩大需求。二是扩大中高收入群体规模。加快推进产业升级,提高产业平均工资水平,壮大中等收入群体,健全社会保障制度,确保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培育新兴消费群体,为企业依托新质生产力开发新产品创造更大的市场机会。三是引导市场需求向个性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支持企业依托新质生产力,开发满足消费者多样化需求的个性化产品,推动消费品智能化升级,提升产品和服务的便利性、交互性,引导消费者建立环保意识,培育新型绿色消费理念。四是提升消费者信心和能力。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增强消费者在医疗、养老等方面的保障,善用数字化转型推动老年群体消费,实现“数字鸿沟”向“数字红利”的跨越<sup>[26]</sup>,完善消费维权机制,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增强其消费信心,开展消费者教育培训,提高消费者的理性选择和消费能力。

### (三) 聚焦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

战略性新兴产业是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载体和直接参与国际竞争的主体,是占据国际竞争主动权的关键。一是完善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创新体系,优化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生态系统,营造有利于技术创新和成果转化的良好环境,促进各类创新要素高效集成。充分调动各方积极性,为新质生产力的研发与应用创造良好的创新环境。二是推动产业链供应链数字化循环化转型升级,围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构建绿色低碳、智能高效的产业链供应链体系,提升产业链水平和

抗风险能力。加快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推动生产、管理、服务的全流程数字化,增强产业链供应链的柔性协同,以发挥新质生产力的优势,实现产业链的智能化升级。三是完善政策支持体系。制定有针对性的财税、金融、投资、贸易等政策,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健全标准体系和监管机制,引导产业按照高标准发展,提升产品和服务的国际竞争力。为新质生产力的应用提供有力的制度保障,最终推动企业借助新质生产力提升在全球产业链中的位势,增强战略性新兴产业在全球的竞争力。

### (四) 以科技创新为导向推动传统产业转型

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是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应用领域,也是实现产业现代化和提升国际竞争力的关键。一是构建多层次科技创新体系,完善产业技术创新网络,打造有利于科技成果产业化的创新平台,推动创新资源高效配置。充分发挥企业创新主体作用,为传统产业升级提供持续的技术支撑和创新动力。二是促进传统产业智能化绿色化协同发展,面向制造业转型升级需求,建设数字驱动、绿色环保的现代产业体系,提升产业链现代化水平和综合竞争力。加快传统产业数字化改造,推进研发设计、生产制造、经营管理全过程智能化升级,增强产业链上下游协同效应,充分释放新质生产力的创新潜能,实现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三是健全政策保障体系。实施精准的产业政策、创新政策、金融政策和人才政策,为传统产业转型营造良好的发展

环境。完善质量标准体系和技术创新激励机制,引导企业走高质量发展道路,提高产品和服务的市场竞争力。为新质生产力在传统产业中的深度应用提供制度支持,最终推动传统企业借助科技创新提升核心竞争力,增强产业在国际市场中的影响力。

## 五、结语

本文从新质生产力的理论内涵出发,深入分析了以新质生产力塑造国际竞争力的内在逻辑,并结合当前以科学技术创新为竞争导向、以战略性新兴产业作为重点竞争领域、以产业政策与贸易限制措施为主要竞争手段、以数据治理作为国际竞争新赛道为特征的国际竞争形势,提出了相应的战略路径。研究表明,新质生产力的形成是塑造国际竞争力和在国际竞争中获取优势的关键,并提出了中国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塑造国际竞争优势适应国际竞争形势的可能路径,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但本文的研究方法主要是从理论和概念层面进行定性分析,对于新质生产力具体如何塑造一国不同产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及其对于国际竞争力的影响如何量化和度量,仍然需要更多的具体案例分析与实证检验进行支撑。未来的研究可以结合更多具体的产业或企业案例与数据,进行更具体详细的深入研究,进一步完善对于新质生产力和国际竞争力的理论研究。

### 参考文献:

[1] PORTER M E. Clusters and competition: new

agendas for companies, governments and institutions, on competition [M]. Boston: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ess, 1998.

[2] 阎学通. 美国遏制华为反映的国际竞争趋势[J]. 国际政治科学, 2019(2): 3-6.

[3] 陈楠, 蔡跃洲. 新科技革命下主要经济体制制造业发展战略与国际竞争格局[J]. 学习与探索, 2020(12): 121-129.

[4] 裴长洪, 刘斌. 中国对外贸易的动能转换与国际竞争新优势的形成[J]. 经济研究, 2019(5): 4-15.

[5] 余南平, 冯峻锋. 数字经济时代的新型国际竞争[J]. 现代国际关系, 2022(1): 35-43, 60, 62.

[6] 黄群慧, 盛方富. 新质生产力系统: 要素特质、结构承载与功能取向[J]. 改革, 2024(2): 15-24.

[7] 蔡继明, 高宏. 新质生产力参与价值创造的理论探讨和实践应用[J]. 经济研究, 2024(6): 15-28.

[8] 蒋永穆, 乔张媛. 新质生产力: 逻辑、内涵及路径[J]. 社会科学研究, 2024(1): 10-18, 211.

[9] 方敏, 杨虎涛. 政治经济学视域下的新质生产力及其形成发展[J]. 经济研究, 2024(3): 20-28.

[10] 张翱, 孙久文. 数字经济发展与新质生产力的生成逻辑[J]. 学术研究, 2024(5): 87-95.

[11] 任保平. 生产力现代化转型形成新质生产力的逻辑[J]. 经济研究, 2024(3): 12-19.

[12]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23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编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13] 周文, 许凌云. 论新质生产力: 内涵特征与重

要着力点[J]. 改革,2023(10):1-13.

[14] PORTER M E. The competitive ad-vantage of nation[M]. New York:Free Press,1911.

[15] 林嫻嵐. 大国科技竞争与国际大科学合作的国家战略选择——基于中美案例比较分析[J]. 东北亚论坛,2024(3):33-46,127.

[16] 孙海泳. 美国对华科技施压战略:发展态势、战略逻辑与影响因素[J]. 现代国际关系,2019(1):38-45.

[17] 李应博,林子秋. 技术权力与大国创新:西方国家认知逻辑、行为模式与外溢后果[J]. 政治学研究,2023(5):126-142,210.

[18] FELT U,FOUCHE R,MILLER C A,et al. The handbook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 [M]. Boston:MIT Press,2017.

[19] 李青,韩永辉,张双钰. 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治理的历史经验、现实约束和战略选择[J]. 长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2):36-52.

[20] 姚战琪. 数字经济对中国对外贸易竞争力的多重影响[J]. 财经问题研究,2022(1):110-119.

[21] 孙杰. 从数字经济到数字贸易:内涵、特征、规则与影响[J]. 国际经贸探索,2020(5):87-98.

[22] 韩永辉,黄亮雄,王贤彬. 产业政策推动地方产业结构升级了吗? ——基于发展型地方政府的理论解释与实证检验[J]. 经济研究,2017(8):33-48.

[23] 韩永辉,刘洋. 元宇宙经济的层次架构、运转规律与治理方向[J]. 国际经济评论,2023(3):95-120,7.

[24] 韩永辉,张帆,彭嘉成. 秩序重构:人工智能冲击下的全球经济治理[J]. 世界经济与政治,2023(1):121-149,154-155.

[25] 陈升,张岸. 数据要素在现代经济中引领创新发展的作用机制与挑战[J]. 长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3):47-59.

[26] 任保平,赵寅喆. 中国数字鸿沟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及其测度[J]. 长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4):30-45.

(责任编辑:杨南熙)